

书籍史是20世纪后半叶在欧美学术界逐渐兴起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以及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讨论的议题或显或隐地集中于书籍与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信仰、制度以及权力变迁的关系上,这也是书籍史研究的核心议题。本期三篇文章从书籍史的视角,分别聚焦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书籍的制作与流通、15世纪末德国印刷业的发展、印刷媒介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认同,探讨了书籍在推动文艺复兴、建构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以飨读者。

## 加洛林文艺复兴:一种书籍史的视角

□ 张炜

查理曼作为加洛林王朝的一代雄主,其主要功绩在于大大扩展了法兰克王国的统治疆域,涵盖了今欧洲大陆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以及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为了在其广袤国土上实行有效治理,查理曼急需一批受过教育、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士。由于西欧之前的分裂混乱,在查理曼当政初期,文化知识在其国家已普遍被遗忘,无法满足其治国的需要。有鉴于此,查理曼决定以基督教会为突破口,实施多种富有远见的政策措施,以提高神职人员的知识水平,最终使加洛林王朝在政治、宗教、文化发展水平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被后世史家奉为“加洛林文艺复兴”。书籍作为这一时期知识传输的主要渠道,在这场文化复兴运动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 缮写室的建立与抄写员的工作

有感于本土学术水平的低下,查理曼延揽约克的阿尔昆、比萨的彼得、伦巴第的保罗、西班牙的狄奥多夫等欧洲杰出学者进入其宫廷,并成立了宫廷学校,培养高级官员和教士。公元789年,查理曼颁布《教育法令》,命令每个主教区和修道院都要安排教授赞美诗、算术、语法等课程,并要求仔细校订教材。而宫廷学校内的许多学者,后来亦纷纷从事具体的教学工作。

为了满足各地文化发展的需要,王国境内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专门用于抄书的缮写室。查理曼曾写信给德意志中部的富尔达修道院院长,敦促其提高修道院和周边地区的文化水平。科隆大主教希尔德巴尔德作为查理曼的密友,曾指示里昂主教抄写一部书籍,而该书是教

皇利奥送给查理曼的礼物。

随着所抄书籍数量的增长,对抄写员的需求数量和技术要求也越来越高。抄写员须经正规的培训,方能从事这项工作:他们首先要懂得笔顺,进而学写字母和音节。此外,同一缮写室的抄写员通常要按照相同笔顺进行书写。在掌握了这些技能后,抄写员便要坐在凳子上,俯身于斜面前,手拿鹅毛笔,蘸取从植物中提取的墨水,在羊皮纸上从事抄写或配图的工作。至于抄写工序,有时是一个抄写员负责整本书,如瓦朗谢讷修道院的一位抄写员,曾用34天时间独自完成一部圣哲罗姆的评注卷;更多时候则是由数十位抄写员合作完成,如图尔修道院的多位修士一道抄写了《图尔法令全书》。学术界原先认为,中世纪早期制作书籍的权利只属于修道院内的男修士。然而,有研究表明,当时并不只有男修士才有抄书的能力,修女、主教座堂神甫等也可以成为职业抄写员。现存于牛津大学博德利安图书馆的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8世纪手抄本),便是14位修女共同完成的杰作。而一旦抄写完毕,缮写室负责人通常要对文本进行校对,以保证质量。据统计,制作于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手抄本,留存至今者多达7000余册(一说为9000册),相比墨洛温王朝时期的500余册,不啻一个巨大的飞跃。

### 手抄本的内容、语言与字体

抄写员抄写的作品起先多为宗教作品,后来源自罗马的古典作品也成为这一时期手抄本的一大主题。普林尼、亚里士多德、多纳图斯、普利西安等人的著作都曾为阿尔昆在约克的收藏品。当他来到查理曼的宫廷后,亦将其带到欧洲大陆。此后,古典作品不断被发掘整

理,如西塞罗的哲学与修辞著作、恺撒的作品、贺拉斯的诗作等都是初次在中世纪的欧洲出现。在这些古典作品中,亦包含有大量拉丁语语法书,拉丁语在这一时期被传播到包括北欧在内的欧洲很多地区。就连一向被人忽视的希腊研究,也因希腊-拉丁语语法书及双语礼仪书籍的传抄而有所复兴。与此同时,从8世纪起,以古高地德语、古法语等语言抄写的手抄本也大量问世,预示了法语、德语、英语等地方性语言的诞生。此外,抄写法律、产权交易、税收等内容的文本也成为抄写员的工作。

查理曼对文字颇感兴趣。他认为:“只有正确地使用文字,才能学会正确的思考。”并曾告诫道:“抄写者——请不要胡乱书写。”伴随手抄本的大量生产,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手写方式上的重大变革。墨洛温王朝后期的手写体,其字母相互纠缠在一起,组合在一起几乎成为无法辨别的一团墨迹,亦被称为墨洛温草书。以这样的手写体完成的书籍,很容易导致内容以讹传讹。大约在公元771年至778年间,科尔比修道院的抄写员在半安塞尔字体和墨洛温草书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新的手写体。这种手写体的字形较小,字母被巧妙地连接在一起,既优雅又容易辨认,被称为加洛林小写体。在阿尔昆的影响下,这种字体很快在不列颠、西班牙、意大利北部等地得到普及。正是从加洛林小写体中,其后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汲取灵感并创造出后来印刷的罗马字体。而一些重要标点符号(如同号),也是在查理曼统治时期被创造出来的,这些都大大有利于受众对文本的阅读理解。

查理曼自己的图书馆,自然是各类书籍的汇聚之地。他的庭中会遵照指示,四处搜寻各类手抄本,并运回其宫廷所在地亚琛。其藏书不仅包括神学书籍,也有大量与实际问题和知识应用有关的作品,如罗马土地测量用书等。查理曼认为,作为统治者,他有责任向各种各样的学问打开其宫廷大门。

除宗教作品外,古典书籍也逐渐进入各大修道院图书馆。在包括富尔达修道院在内的很多修道院图书馆的馆藏中,不乏西塞罗、波伊提乌斯、伊西多尔等人的作品,或可视为书籍传播制度化的见证。而在很多教区教堂内,也多放置一个书架用于摆放书籍。自14世纪以后,很

### 手抄本的流通与收藏

这一时期,在伦巴第、西班牙和不列颠诸岛之间,存在频繁的书



中世纪欧洲的抄写员

多意大利人发现了圣高尔等修道院图书馆内的大量拉丁文藏书,这成为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典文学的重要依托。事实上,古典作品的现代版本有90%以上都是以加洛林时期的手抄本为蓝本制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加洛林文艺复兴与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一脉相承。

查理曼推动基督教会大量制作手抄本,将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与蛮族传统相融合,为其治国理政服务的做法,体现了政治制度、文化模式和传播媒介之间的紧密关联。而从书籍的角度观之,加洛林文艺复兴虽然缺乏一定的原创性,而且知识的传播也基本是在教士阶层内部进行,尚未对普通民众产生显著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复兴运动在欧洲文化发展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融汇与传承之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印刷媒介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认同

□ 陈金锋



1476年,英国人威廉·卡克斯顿将印刷术传入英格兰。

15世纪中期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将中世纪晚期以来以纸张的使用、手抄书的批量生产和书籍贸易为特征的欧洲“书籍革命”推向高潮,同时也开启了印刷媒介参与近代欧洲社会转型的序幕。在近代早期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印刷媒介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1476年,英国人威廉·卡克斯顿将印刷术传入英格兰。接下来的三个多世纪,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革命与复辟等社会背景下,大量文学、宗教、教育、史地类印刷品以及新闻报刊的出版,从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历史观和价值观方面建构了英国民族认同。

首先,英语类印刷品的生产和广泛传播使英语逐步摆脱中古时期的口语化和地方性,初具民

族标准语的雏形,成为“国王的语言”“国家语言”。作为一种商品,印刷书从一开始就遵循严格的利润法则。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其生产者印刷商最先简化和规范了书写英语,将手稿编辑、校订为市场上流通的印刷本,从而避免了因拼写方法不同而导致的版本、内容差异。其次,印刷书在短时间内的生产和传播,使得书写英语迅速固定化,进而催生了阅读群体的出现,对民族国家的最初“想象”恰恰是在他们中间发生的。最后,英国以伦敦为中心的印刷业发展模式,以及印刷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单向流动性,使得英语的规范化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由精英阶层、知识分子推动并不断走近大众的过程。

英语的标准化是英国迈向现代文明的重要一步。到18世纪,英语

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成为一种文化,成为民族认同的纽带。大量英语印刷品的出版,使英法百年战争以来持续高涨的民族情绪得以公开表达,进而增长了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其次,大量用英语写成并印行的宗教类读物使英国国教的核心教义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广为传播,促成新教信仰共同体的产生。中世纪晚期以来,英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自始至终充满了与“异己”的对立。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后逐渐确立的新教信仰是英国区别于天主教法国、西班牙的最好标签,也是将不列颠各地区凝聚在一起的黏合剂。印刷媒介诞生之初,都铎王室便通过任命王室印刷商,授予印刷特权等形式实现了对印刷媒介的掌控和利用。为将英国变为真正的新教国家,在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的几位大臣托马斯·塞西尔、托马斯·克伦威尔、托马斯·克兰默的推动下,一系列主张简化宗教仪式、强调内在信仰的宗教类读物相继出版。从样式来看,这类印刷品多为口袋书、册页,方便携带、传播;从出版数量来说,清教传教士威廉·珀金斯的布道词在1640年前出版过128版,远超同一时期莎士比亚的作品(约90版)的历史剧,这些作品中关于不列颠的神话起源被不断提及,都铎君主被塑造为亚瑟王的后代。经过都铎王权和精英阶层的重塑,不列颠人由中世纪时期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的代名词,向“英格

兰人和‘凯尔特’各族”的共同称呼演变,不列颠由一个地理概念向政治文化共同体演变。

除论著外,新闻报刊的出版使不列颠各地区能同时关注和感受重大事件,有助于共同价值观的形成。1640年革命的爆发,使英国的新闻报刊从“科兰特”到《日报》获得迅猛发展。1695年《特许经营法》废止后,英国成为欧洲的报刊发行中心之一,印刷媒介的社会性更加突出。在17世纪,一个识字的人可以轻易地获取到英文版的报纸,通过王权与议会的斗争、革命的进展、英荷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共享,印刷媒介促成了不列颠各地形成统一的心理归属感,这正是1707年英苏、1801年英爱政治合并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认同基础。

综上所述,印刷媒介通过推动英语的标准化、促成新教信仰共同体的产生、塑造共同的民族历史观和价值观,在英国民族认同的建构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影响应置于长时段(15—18世纪)和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中加以考察。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系讲师)

# 世界史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654  
邮箱:gmrbsjs@163.com

1454年,德国人谷登堡在美因茨成功使用金属活字印刷术出版了第一部拉丁文书籍,开启了欧洲印刷革命的新纪元,西方书籍由中古世纪手抄本步入机器量产时代。1458年,从美因茨学成归来的约翰内斯·曼特林在斯特拉斯堡创立印刷工坊,随即谷登堡的学徒们又将印刷技术带到科隆、奥格斯堡、纽伦堡、莱比锡、巴塞尔等地,二十年间金属活字印刷术在整个德国落地生根。

15世纪末的纽伦堡是德国贸易和手工业中心,也是人文主义重镇。这座被马丁·路德称为“德意志耳目”的城市,印刷业的起步却略显滞后。1470年,意大利的萨比科、罗马、威尼斯、弗里诺、特雷维,甚至法国巴黎都已各自拥有独立的印刷工坊,此时纽伦堡的印刷商科贝格刚开始创立第一间印刷工坊。安东·科贝格约于1440年至1445年间生于纽伦堡一个工匠世家,初为金匠,1470年结束金匠生意,成立了自己的印刷工坊。1488年,科贝格当选纽伦堡大会议员,与哈德曼·舍德尔、泽巴尔德·施莱尔等人人文主义者成为同僚。与精于创新却拙于经营的谷登堡不同,科贝格是一位颇有胆识与远见的印刷商,他坐拥两家造纸厂,印刷用纸自给自足,无须远赴意大利采购,有效控制了印书成本。除关注提高印刷品质外,他还积极开辟书籍外销市场,威尼斯、米兰、巴黎、里昂和维也纳等地都设有营销分部。1472年,科贝格的印刷工坊印刷出版了第一部摇篮本——阿尔喀诺俄斯的《柏拉图箴言》(摇篮本,在印刷史上专指1454年至1500年年底在西欧以金属活字印刷出版的所有书籍)。1480年,印厂规模赶超谷登堡的合作者和继任者——美因茨的舍弗尔坊,一跃成为德国最大的印刷工坊,盛时一天要启动24台印刷机,百余名排字工、印刷工和助理参与书籍制作。与此同时,科贝格开始与纽伦堡插画家米夏埃尔·沃尔格穆特展开合作,二人共同出品了《编年史之书》(以下简称《编年史》)。自此,科贝格工坊成为欧洲知名的印刷工坊,订单应不暇接,至15世纪末,已然成为欧洲最知名的四大印刷工坊之一,印刷质量和数量堪称表率。

《编年史》是15世纪德国最著名的插图摇篮本之一,以其繁复的图文排版而闻名于世。整部摇篮本从编撰、绘图到印制、出版,都离不开纽伦堡富商泽巴尔德·施莱尔和内弟塞巴斯蒂安·卡莫迈斯特的资助和推动,二人集合了当时纽伦堡一流的人文主义者、插画大师、印刷商和经销商,使该书成为摇篮本时代最优秀的金属活字印本之一。《编年史》著者哈德曼·舍德尔是一位德国人文主义者、医生、藏书家,1456—1462年间在莱比锡求学,其间曾跟随人文主义者彼得·卢德学习。在帕多瓦,他师从来自希腊的古典学者德米特里欧斯·查尔科孔戴尔,为德国最早一批学习希腊哲学的学生。1466年,舍德尔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返回纽伦堡,1475年当选大会议员,与纽伦堡的各界精英保持着紧密联系,其中便有施莱尔。我们尚不知道舍德尔何时开始编撰《编年史》,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接受了施莱尔及其内弟的倡议和委托。舍德尔依据圣经年表,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七个时期,记录了从“创世纪”到15世纪90年代的历史,并以圣经为框架,讲述人类的历史故事,穿插自然灾害、皇家族谱和一些西方重要城市的历史,辅以人物插图和城市地图等。

舍德尔广泛吸纳了当时盛行的学术观点,包括人文主义的自然科学、哲学理念等。因此,《编年史》不只基于中古世纪流传的圣经故事,也基于新时期已经更新的人类认知。该书拉丁文版于1493年7月12日出版,同时在施莱尔二人资助下,纽伦堡金库的抄写员乔治·阿尔特将其译成德文,同年12月23日出版,两版插画均由沃尔格穆特父子完成,交由科贝格印刷。早期摇篮本还没有题页的概念,人们不得不从其他页面寻找相关信息。拉丁学者通常将此书拉丁文版首页的《编年史之书》作为该书的名称;德文版中,取其著者舍德尔之名,称其为《舍德尔世界历史》;英文版中,则根据出版地将其命名为《纽伦堡编年史》。除外观差别外,德文版的《编年史》比拉丁文版有所删减,剔除了一些深奥的表达与不必要的赘述,只有297页,而拉丁文版为326页。这是因为两个版本目标受众不同,拉丁文版以宫廷、神学和学术领域的读者为主,而德文版则针对新兴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据统计,当时出版了约1400—1500册拉丁文版及700—1000册德文版。一份1509年的资料表明,其中539册拉丁文版和60册德文版当时并未售出。截至目前,尚有400册拉丁文版及300册德文版流传,是已知存世复本最多的一部摇篮本。

施莱尔及其内弟还聘请了纽伦堡当时最负盛名的画家米夏埃尔·沃尔格穆特及其继子威廉·普莱登伍尔夫,由他们来完成全书插画制作以及图文版面设计。沃尔格穆特是匈牙利画家瓦伦汀·沃尔格穆特之子,1434年生于纽伦堡,自幼在父亲画室做学徒,少年游历德国、荷兰,1465年回到故乡,开始在纽伦堡最大画室汉斯·普莱登伍尔夫工坊做工。1472年,普莱登伍尔夫去世后,沃尔格穆特接管了画室生意,与继子威廉·普莱登伍尔夫一起承接各地印刷工坊的地图和插画订单。科贝格印刷工坊最为重要的印刷品《成圣珍宝》和《编年史》插画制作都由他们配合完成。1491年12月29日,赞助商施莱尔正式授权沃尔格穆特制作《编年史》木板插画。实际上,早在1487年,沃尔格穆特便已开始为《编年史》制作插画。1486年,科贝格将其教子阿尔弗雷希特·丢勒送往沃尔格穆特工坊,学徒三年与插画制作周期重叠,有学者认为这位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也参与了部分插画的草图设计。这部《编年史》体现了早期印刷品精良的插图技艺,富有质感的画面让枯燥的文字变得更为易懂。全书实际上制作了652幅插画,而丰富的文本内容需要更多的配图,因此一些插画素材不得不反复使用,最终成书共1809幅插图。他们以超乎想象的排版技艺,将图文巧妙融合,最终成就了这部15世纪最为精致和精致的插图摇篮本,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插图业的发展,也对丢勒的艺术创作道路有所影响。

15—16世纪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早期印刷业的发展,金属活字印刷术的推广和传播,大大缩短了书籍制作周期,降低了维护成本,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变得更为便捷。纽伦堡作为当时德国最大、最富足的城市之一,深受意大利和弗兰德斯的影响,一批像舍德尔这样的人文主义者在意大利接受学术熏陶后返回家乡,与本土的人文主义者施莱尔等人一道传播文艺复兴思潮。由纽伦堡优秀的人文主义者、插画大师、实力最强的印刷工坊共同打造的《编年史》,以近乎完美的印刷技艺和繁复精湛的图文编排,引领本土抄本文化加速向印本文化转变。学习和阅读不再是僧侣和王公贵族的特权,普通民众也可以乐享其中,为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培养了民众基础。

(作者系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从  
编年史  
看十三

徐亚娟